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(下册)

赠阅 请批评、交换
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



I217.1

85

62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(下册)

华南师院 暨南大学 华中师院 广西师院编
武汉师院 开封师院 湖南师院

一九七九年



A 0.8846

目 录

包身工	夏 衍(709)
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	宋之的(720)
第七连	丘东平(728)
放下你的鞭子(街头剧)	(739)
华威先生	张天翼(750)
防空	沙 汀(758)
在其香居茶馆里	沙 汀(770)
人生哲学的一课	艾 芜(787)
▷ 石青嫂子	艾 芜(806)
“差半车麦秸”	姚雪垠(827)
老马	臧克家(842)
罪恶的黑手	臧克家(843)
春鸟	臧克家(850)
“警员”向老百姓说	臧克家(853)
大堰河——我的褓姆	艾 青(857)
向太阳	艾 青(862)
给战斗者	田 间(881)
假使我们不去打仗	田 间(894)
义勇军	田 间(895)
坚壁	田 间(896)
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	何其芳(897)

生活是多么广阔·····	何其芳(898)
我用残损的手掌·····	戴望舒(899)
逼上梁山·····	整理者金紫光(901)
兄妹开荒·····	(957)
白毛女(存目)·····	贺敬之 丁毅等
小二黑结婚·····	赵树理(965)
李有才板话·····	赵树理(982)
王贵与李香香·····	李 季(1028)
漳河水·····	阮章竞(1068)
芦花荡	
——白洋淀纪事之一·····	孙 犁(1106)
荷花淀	
——白洋淀纪事之二·····	孙 犁(1113)
我的两家房东·····	康 濯(1121)
无敌三勇士·····	刘白羽(1144)
“运输队长”蒋介石·····	毕革飞(1157)
东方红·····	李有源(1159)
恩人毛主席·····	(1160)
天不怕，地不怕·····	(1161)
百姓造反·····	(1162)
红军谣·····	(1163)
打仗要打新一军·····	(1164)
雁翎队·····	(1165)
一袋票子半袋粮·····	(1166)
人人心里有团火·····	(1167)
盼太阳·····	王砚田(1168)

就义诗.....	夏明翰(1169)
狱中诗.....	恽代英(1170)
带镣行.....	刘伯坚(1171)
故国山河壮.....	罗世文(1172)
囚歌.....	叶挺(1173)
我的“自白”书.....	陈然(1174)
为祖国而歌.....	陈辉(1175)

包身工

夏衍

旧历四月中旬，清晨四点一刻，天还没亮，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。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：“拆铺啦！起来！”接着，又下命令似地高叫：“‘芦柴棒’，去烧火！妈的，还躺着，猪！”

七尺阔、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“猪”的人。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，充满了汗臭、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，很快的就象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地骚动起来。打呵欠，叹气，叫喊，找衣服，穿错了别人的鞋子，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，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。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，在这些被叫做“猪”的人们中间，似乎已经很迟钝了。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，拎着裤子争夺马桶，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。

那男人虎虎地向起身得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，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，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：

“揍你的！再不起来？懒虫！等太阳上山吗？”

蓬头，赤脚，一边扣着钮扣，几个还没睡醒的“懒虫”

从楼上冲下来了。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，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。“芦柴棒”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，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。她十五六岁，除了老板之外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。手脚瘦得象芦柴棒一样，于是大家就拿“芦柴棒”当作了她的名字。

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。长方形的，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，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。象鸽笼一般，每边八排，每排五户，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，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，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。所以，除了“带工”老板（管理“包身工”的工头）、老板娘、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、“请愿警”（这是一个日本式的名词，在中国，一般叫做“保镖”，旧社会有钱的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出钱向反动政府雇用的警察）……之外，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，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“猪”。

但是，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“包身工”。她们的身体，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“带工”的老板。每年——特别是水灾、旱灾的时候，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带工，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，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、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，去游说那些无力“饲养”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：

“还用说？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。吃的是鱼肉荤腥。一个月休息两天，我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。嘿，几十层楼的高房子，两层楼的汽车，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。老乡！人生一世，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！——做满三年，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！我们是同乡，有交情。——交给我带去，

有什么三差两错，我还能回家乡吗？”

这样说着，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，就是她们的父母，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。于是，在预备好了的“包身契”上画上一个十字，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，期限三年，三年之内，由带工的供给住食，介绍工作，赚钱归带工者收用，生死疾病，一听天命，先付包洋十元，人银两交，“恐后无凭，立此包身契据是实！”

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，属于五十个以上的“带工”头手下。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“机器”。所以，每个“带工”所带包工的人数，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。少一点的，三十五十，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。排场大的“带工”，不仅可以放债，买田，造屋，还能兼营茶楼、浴室、理发铺一类的买卖。

四点半之后，当晨光初显的时候，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。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，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，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，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。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迭迭的名册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——好象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的前面。楼下的那些席子、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，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。十几只碗，一把竹筷，胡乱地放在桌上，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。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，早晚吃粥，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。所谓粥！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，加上很少的碎米、锅巴等煮成的。粥菜？这是不可能有的。有几个“慈祥”的老板，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

叶，用盐一浸，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。

只有两条板凳，——其实，即使有更多的板凳，这屋子里面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。她们一窝蜂地抢着每人盛了一碗，歪着头用舌头舐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，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。添粥的机会，除了特殊的日子，——比如老板、老板娘的生日，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，通常是很难有的。轮着擦地板、倒马桶的日子，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。洋铅桶空了，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，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、残粥，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，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，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、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“机器”们的面前。

“死懒！躺着死不起来，活该！”

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（1925年5月间，上海的日本内外棉纱厂的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，枪杀罢工运动的工人领袖、共产党员顾正红，造成“五卅”惨案），尤其是五年前的“一·二八”战争之后，日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“机器”的需要，突然地增加起来。据说，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。他们大量用廉价而没有“结合力”的“包身工”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。

第一，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，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“做”或者“不做”的自由。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，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，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，用拳头、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。就拿上面讲到过的“芦柴棒”来做个例吧（其实，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遭遇到的），有一次，在一个很冷的清晨，

“芦柴棒”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（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）上了。她们躺的地方，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，可是在那一天，“芦柴棒”可真的不能挣扎着起来了，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，缩做一团，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。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，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。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。干这种职务的人，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，或者是在“地方上”有一点势力的流氓，所以在这种地方，他们差不多有生杀自由的权利。“芦柴棒”的喉咙早已哑了，用手做着手势，表示身体没力，请求他的怜悯。

“假病！老子给你医！”

打杂的一手抓住了她的头发，狠命地把她举起往地上一摔，“芦柴棒”手脚着地，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，踢在她的腿上，照例又是第二、第三脚。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。后来，据说，那是因为“芦柴棒”那突出的腿骨，碰痛了他的脚趾！打杂的恼了，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抹桌子的冷水，迎头泼在“芦柴棒”的头上。这是冬天，外面在刮寒风，“芦柴棒”遭了这意外的一泼，反射地跳起来，于是在门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：“瞧！还不是假病！好好地会爬起来，一盆冷水就医好了。”

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。

第二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，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，这一点，在“管理”上是极有利的条件。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，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“工房重地，闲人莫入”的木牌，使这些“乡下小姑娘”和外边的世界隔绝之外，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的老板。

这样，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，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，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。所以包身工是一种“罐装了的劳动力”，可以“安全地”保藏，自由地使用，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。

第三，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。包身工由“带工”带进厂里，厂方把她们叫做“试验工”和“养成工”，试验工的期间表示了厂家在试验你有没有工作的能力，养成工的期间那就表示了准备将一个“生手”养成为一个“熟手”。最初的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，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、开花衣、扛原棉、松花衣之类。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、条子间、粗纱间去工作。一些在日本通例是男工做的工作，在这里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了下来。

五点钟，上工的汽笛声响了。红砖“罐头”的盖子——那扇铁门一推开，就好象放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。包身工们走进厂去，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。

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，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，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。可是在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，就不象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。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，就是音响、尘埃和湿气！

到杨树浦去的电车经过齐齐哈尔路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听到一种“沙沙的急雨”和“隆隆的雷响”混合在一起的声音。一进厂，马达的吼叫、皮带的拍击、锭子的转动、齿轮的磨擦……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，好象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地紧装在这红砖墙的厂房里面，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，也

决没有使你的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的时间。

尘埃，那种使人难受的程度，更在意料之外了。精纺、粗纺间的空间，飞扬着无数的“棉絮”。在那种车间里面，不论你穿什么衣服，一刻儿就会变成灰的。爱作弄人的小恶魔一般地在空中飞舞着的花絮，“无孔不入”地向着她们的五官钻进，头发、鼻孔、睫毛和每一个毛孔，都是这些花絮寄托的场所。要知道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觉，那你可以假想一下，——正象当你工作到出汗的时候，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个木棉絮的枕芯，而使这些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！纱厂女工做十二小时的工，据调查，每人平均要吸入0.15克的花絮。

湿气的压迫，也是纱厂工人——尤其是织布间工人最大的威胁。在织布间，蒸气好象烟雾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不见他人。身上有一点被蚊、虱咬开或者机器碰伤而破皮的时候，很快地就会引起溃烂。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高温下面工作的情景，那就决不是外面人所能想象的了。

没有人会来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！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，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，加速度地容易疲劳。但是野兽一般的“拿摩温”（工头）和“荡管”（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）监视着你。只要断了线不接，锭壳轧坏，皮辊摆错方向，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，就会有遭到毒骂和毒打的危险。包身工是“拿摩温”和“荡管”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。在纱厂，活儿做得不好，罚规大抵是殴打、罚工钱和“停生意”三种。那么，从包身工所有者——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，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了。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，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，还要贴她二粥一饭，于是带

工头不加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。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，带工头总要送礼给“拿摩温”们，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屁地说：“总得请你帮忙，照应照应。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打，打死不要紧，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！”

打死不要紧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包身工当然是“人人得而欺之”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，就遭了“拿摩温”的殴打，恰恰运气坏，一个“东洋婆”（日本女人）走过来了，“拿摩温”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，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，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。东洋婆望了一会，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“文明”的殴打，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“合理”的惩戒方法，走近身来，揪住小福子的耳朵，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，叫她向着墙壁立着；“拿摩温”跟着过来，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地，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，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。东洋婆会心地笑了：“这个小姑娘坏得很，懒惰！”

“拿摩温”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：“这样她就打不成瞌睡了！”

这种“文明的惩罚”，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。两小时不做工作，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，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，也就是分内的事了。殴打之外还有饿饭、吊起、关黑房间等等方法。

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，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，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。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，1902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，锭子还不到两万，可是三十年之后，他们

已经有了六个纱厂，五个布厂，二十五万个锭子，三千张布机，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。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，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，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。那末，我也这样联想，日本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！

“一·二八”战争之后，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，这特征就是“劳动强化”。统计的数字，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，和工人人数的减少。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，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。举一个例，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，就有二十四个人是包身工。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，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，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，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！

两粥一饭，十二小时工作，劳动强化，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，猪一般的生活，泥土一般的被践踏，——血肉造成的“机器”，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；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间，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。工作，工作，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，手脚象芦柴棒一般的瘦，身体象弓一般的弯，面色象死人一般的惨，咳着，喘着，淌着冷汗，还是被压迫着在做工。比如讲“芦柴棒”吧，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，放工的时候，厂门口的“抄身婆”（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）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：“让她揩点油吧！骷髅一样，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！”

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！有人觉得太难看了，对她的老板说：“比如做好事吧，放了她！”

“放她？行！还我二十块钱，两年间的伙食、房钱。”

他随便地说，回转头来对她一瞪，“不还钱，可别做梦！宁愿赔棺材，要她做到死！”

“芦柴棒”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，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，两年来带工老板在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！

还有一个，什么名字记不起了，她熬不住这种生活，用了许多工夫，想办法偷偷地托一个在补习学校念书的外头工人，写了一封家信给她父母，邮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。一个月，没有回信，她在焦灼，她在希望，也许，她的父亲会到上海来接她回去，可是，回信是捏在老板手里了。放工回来的时候，老板和两个打杂的站在门口，满脸横肉的老板赶上一步，一把扭住她的头发，踢，打，掷，骂：

“死婊子！你倒有本事，打断我的家乡路！”

“死猪，一天三餐将你喂昏了！”

“揍死你，给大家做个榜样！”

“谁给你写的信？讲，讲！”

鲜血和惨叫使整个工房的人都怔住了，大家在发抖，这好象真是一个榜样。打够了以后，再在老板娘的亭子楼里吊了一晚。这一晚，整屋子除了快要断气的呻吟一般的呼喊之外，再没有别的声音。屏着气，睁着眼，千百个奴隶在黑夜中叹息她们的命运。

人类的身体构造，有时候觉得确实有一点奇怪，长得结实肥胖的，往往会象折断一枝麻梗一般很快地死去，而象“芦柴棒”一般的，却偏能一天天地磨难下去！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，可是她还有韧性地在那儿支撑，直到被榨完了残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。

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谋利的制度，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，和乌鸦很相象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，整排地停在船上，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，下水捕鱼，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，吐了再捕，捕了再吐，墨鸭整天地捕鱼，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。但是，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，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，而现在，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，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！

在这千万被饲养的中间，没有光，没有热，没有温情，没有希望……没有法律，没有人道。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、机械、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！

黑夜，静寂得象死一般的黑夜，但是，黎明的到来，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。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，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，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！

1936年6月

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

宋之的

一

春被关在城外了。

只有这时候，从野外吹来的风，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，很细微，很新鲜，很温暖，并且很有生气。在这种感觉里，你可以想到，河许已解冻了，草已经发芽了，桃花也在吐蕊了吧！

但我却出不了城。

一整天，我所见的，是灰色的墙，灰色的土，和穿着灰色衣裳在街守望的兵。

我气闷而且窒息。连行动也被强度的限制着了。出城，要通行证；到街上去，要好人证。并且七点钟已经开始戒严了。为了免掉那些灰色同志对你取攻击式，端起枪来，并且对准你的脑袋，我只好一个人关在屋子里。

而我的屋子，又恰巧临着街。一整夜，我全听见扳枪机和喊“口令”的声音，这在深夜里，特别加重了恐怖的氛围。

二

同事间已有人配着“好人证”来上课了。